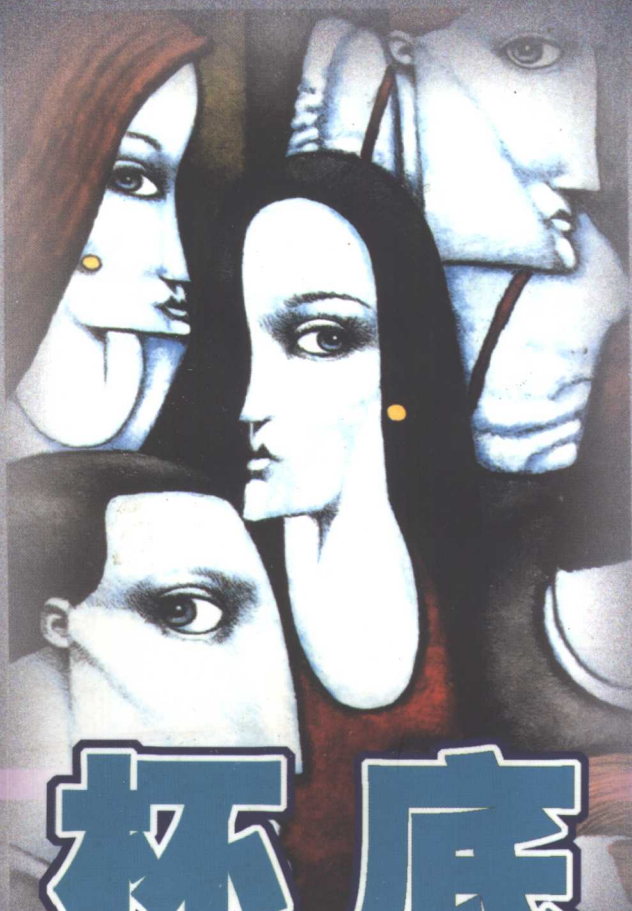




杯底

El fondo del vaso

〔西班牙〕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杯底

El fondo del vaso

杯底

〔西班牙〕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杯底/(西班牙)阿亚拉(Ayala, F.)著;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ISBN 7-5327-2481-6

I. 杯... II. ①阿...②李... III. 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818 号

Francisco Ayala EL FONDO DEL VA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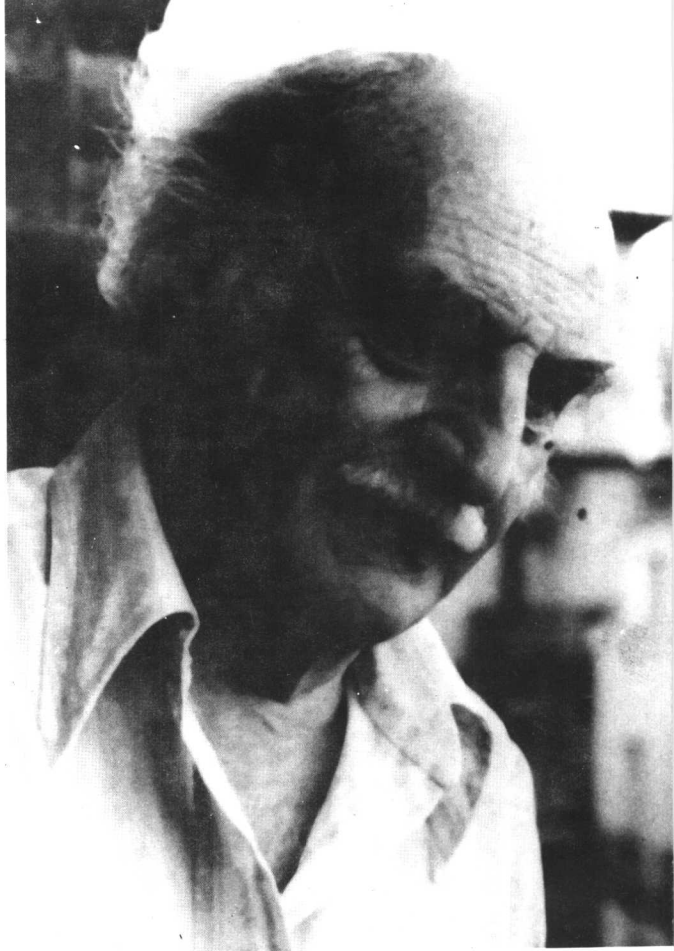
本书根据 Alianza Editorial, S.A. Madrid, 1970 年版本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9-205 号

杯 底

[西]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5 字数 128,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481-6/I·1450
定价:10.30 元



〔西班牙〕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译 序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1906年3月16日生于西班牙南方古城格拉纳达,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他于1927年移居首都马德里,在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已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31年回国,出任国会律师。1932年,被聘为格拉纳达大学政治系教授。第二共和国期间(1931—1936),他加入阿萨尼亚^①领导的共和行动党。正当他在学术和文学领域崭露头角、蒸蒸日上时,西班牙爆发内战(1936—1939)。内战结束后,他流亡南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创办杂志《现实》。他还经常为《国民报》、《太阳报》撰写稿件。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教授。1950年移居波多黎各,那里聚集着许多西班牙流亡者。他在里约·彼得拉斯大学创办了大学出版社和《高塔》杂志。1956年移居美国。此后的20年间,他在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等学校教授文学。这期间,他发表了两部最重要的小说,即《惨死如狗》和《杯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从此,他开始走红西班牙和世界文坛。1969年,他定期返回祖国西班牙,但在那之前,他的作品已在西班牙面世。1981年,他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8年,

加入西班牙皇家学院。1991年,获得西班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至此,他成为西班牙作家中唯一获得“国家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两项奖的得主。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1925 年开始涉足文学创作领域。那一年他发表了《一个没有灵魂男人的悲喜剧》,这是一部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宣称,他的创作遵循“纯文学”道路。次年,发表《一个黎明的故事》,主要描写一位青年学者的政治忧虑。1929 和 1930 两年分别发表了《拳击手和天使》与《黎明中的猎手》,以此加入西班牙一批青年学者倡导的小说革新运动。这两部小说被评论界称为“理性主义、讽刺和残酷”小说的典范。他在阿根廷开始流亡生活不久便在《南方》杂志上发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题目是《死人对话(“西班牙哀歌”》),它标志着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他本人宣称的“成熟阶段”^②。欧亨尼奥·德·诺拉^③在《当代西班牙小说》中说:“……他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用自信和准确的笔触写作了;主题,处理主题的方法,语言……都是全新的。这一切表明,作为小说家,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④1944 年发表《伪装者》。这篇小说于 1949 年收入《篡权者》的小说集中,作品以描写西班牙历史为主。1949 年发表的《羊头》收入四篇小说,以描写西班牙内战为主题。在这个集子里,他已经摆脱了“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传统写作方法。1955 年,他发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名为《丑陋者》,这也是他的出现在战后西班牙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其言行、语言都滑稽可笑的人物,它为 1958 年和 1962 年分别发表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代表作打下了基

① 阿萨尼亚(Manuel Azafia, 1890—1946),西班牙政治家、作家,三次出任政府首脑;1936 年出任共和国总统。

② 引自《我的最好篇章》,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65。

③ 欧亨尼奥·德·诺拉(Eugenio de Nora, 1923—),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学博士,西班牙文学教授,著名诗人。

④ 《当代西班牙小说》,三卷本,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1978。

本框架。这两部作品集中描写了拉丁美洲某国独裁统治、垮台以及垮台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使得“独裁小说之父瓦列-因格兰的《暴君班得拉》一书的欠缺绝妙地得到了弥补”。1963年和1965年,他出版了两个集子,书名分别为《王牌》和《拐骗》。1971年,《优雅花园》问世,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该书第二年获得“评论”文学奖。他的《回忆与遗忘》是散文小说的杰作。1982年出版了《胜利与悲哀》;1983年和1988年分别发表了《流亡》和《回归》。1997年,他将最近十几年来创作的杂文汇编成书出版,名为《我和时间》,收入的文章涉及文学、艺术、体育、旅游、忆旧等内容,目的在于阐述生活经验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

此外,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还著有文学评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力作,以及散论和译著,数量颇丰。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位世纪作家,在长达7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由于他的学识广博,思维锐敏,想象丰富,技巧高超,将《堂吉珂德》作者的技巧同先锋派的写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仍然在世的西班牙作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群一致高度评价的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除了前面提到的欧亨尼奥·德·诺拉外,如博尔赫斯^①,加诺^②,库容^③,杜兰^④都写有专著,全面研究和评论他的作品。

《杯底》(El fondo del vaso)以及它的前篇《惨死如狗》是弗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最重要的叙述文学作品,受到西班牙语各国和世界文坛的广泛重视和好评。这部小说发表于1962年,是在此四年前发表的《惨死如狗》的姐妹篇,内容上有一定联系,也以第一人称“我”写成,但这个“我”已经不是那个肢体瘫痪,名叫路易斯·皮内多(在书中常

①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

② 加诺(José Luis Cano, 1912—),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③ 库容(Ricardo Güllón, 1908—),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

④ 杜兰(Manuel Durán, 1923—),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常以小指词皮内迪托出现)的人,而是何塞·利诺·鲁伊茨,一家商业连锁点的老板。

“我”很想为在《惨死如狗》中被其秘书杀害的总统博卡内格拉写一本辩护的书,并请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帮忙;骚乱过后,罗得里格斯从国外回来,重新在复刊的《商报》编辑部工作。“我”耍笔杆子决不像拿台球杆子打球那样轻车熟路,因而必须请个人在文字上把关。在“我”和罗得里格斯的接触中,发现他与“我”的妻子克利娜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后来,妻子向“我”坦白了她的那段“闪失”的历史。“我”认为那是妻子对“我”的报复,因为她早就知道:骚乱期间,“我”跑到邻国避难时,都要带上女秘书坎迪。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写作辩护书的计划始终没有按照原来希望的那样进行下去,而是沿着“我”与女秘书坎迪的关系这一线索发展起来。坎迪对“我”渐渐厌倦了,开始与罗得里格斯的儿子小罗得里格斯来往,并且关系发展很快,不久便商量结婚的事了。“我”不安,“我”嫉妒,设法跟踪他们,窃听他们的谈话,想更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这时,坎迪从“我”的连锁店调到国民银行办事处,已经不来办公室上班。她的位子天天空在那里,“我”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但不想找人替代她。“我”为了能够见到她,便想了个法子,亲自给她送支票(她调走时没有结算工资,这是补发,“我”还有意多写了一些钱数)去,届时看看能不能挽回旧情。她不但对“我”很冷淡,而且竟然把支票揉搓后扔到烟灰缸里。经“我”提醒之后,她才拾了起来,“我”感到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我”还求助多米尼奇——是他把坎迪拉到他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银行的,让他探听一下坎迪的想法。事情这样发展着。一天,突然传来消息,小罗得里格斯被杀,人们在郊外发现了他的尸体。以陆皮诺为首的警方对案件展开了调查,先后传讯了坎迪及其父亲,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与死者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家离案件现场很近。这当口儿,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结果“我”被捕入狱,成了命案的嫌疑人。警方同时还对小罗得里格斯生前所在的年轻人的团伙“宇宙之龙”以及“老子天下第一”和邪教团体“幸福上帝”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一些线索,死者可能是它们之间内部

矛盾和械斗的牺牲品。

“我”在监狱里，面对四壁，思绪万千。妻子来看望“我”，并向“我”坦白了她的“闪失”。她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说这种事？“我”思前想后，做了种种假说，最后得出结论，她是“一箭三雕”，杀害小罗得里格斯，既向“我”报了仇，也向坎迪报了仇；同时又对罗得里格斯报了仇，因为罗得里格斯后来抛弃了她，另寻新欢去了。

《杯底》这部作品由三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作用不同，文体不同。第一部分是叙述文学文体，起着承前（和《杯底》的前篇《惨死如狗》连接起来）启后（引出本部作品的情节来）的作用。在这部分中，“选美”这个插曲和《惨死如狗》中的国庆活动有同工异曲之妙，评委们把“选美”活动变成了为自己的“选妃”机会。如果说《惨死如狗》揭露统治阶层内部的种种丑态的话，《杯底》则着重描写那个国家、那种社会一般阶层，乃至家庭、夫妻之间无信可言、互相欺骗、极端自私的世风，作者辛辣地讽刺了那个畸形社会。第二部分是新闻文体，大量引用报刊对案件的采访和报道。这一点连同受众的猜测以及警方的调查，命案被渲染得复杂无比，给人一种“无头案”的深刻印象。第三部分是“我”的狱中独白。一个人“含冤”入狱，本来就会想得很多，更何况又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从而脑海里沸腾起来，出现许多假想。这使那桩命案变得双倍复杂起来，如同《惨死如狗》中，作者利用高超技巧把围绕总统之死发生的事件描绘得“乱上加乱”一样；另外，悬念层出不穷，开放式的结尾，等等。这一切都要求读者发挥主动性，从乱麻中理出个头绪来。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强调一点，即现代小说要求读者成为第二创作人，用接受美学武装自己，成为积极的读书人。即使这样，我觉得要“侦破”那桩命案，说不定有的读者还得把这部小说研读好几遍呢！这是弗朗西斯科·阿亚拉作品的妙处所在。他能够多聚焦、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尖锐地剖析问题的实质。他别具匠心，利用现代小说特有的方法为读者设计一个万花筒似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具有时

空感,立体感。读这样一部作品是美的享受。

读过《惨死如狗》和《杯底》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是以这些学问为基础写作的大手笔,不愧为“西班牙二十世纪的伟大经典作家”^①。

李德明

1999年4月

^① 引自《佛朗西斯科·阿亚拉作品大览》,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1998。

第一部分

I 死人和活人

我决不是一个虚幻的幽灵。我不是从寒气逼人的墓穴里爬出来的。如果愿意，你们可以触摸我。我的名字叫何塞·利诺·鲁伊茨……对，我叫这个名字，那个曾是有血有肉的何塞·利诺，被人称为“蠢驴般的何塞·利诺”。皮内迪托^①说我讲起话来从来也不会脸红的。不过，他每每讲过这话之后，总是怜悯地补充一句：但愿上帝能宽恕他！……怎么，是不是也要宽恕他？他确实需要宽恕！你，皮内迪托，那么阴险、狡猾、老谋深算，那么急匆匆地向我发放死亡签证！可是，不管你怎样用眼睛寻找，也不能在阴曹地府的成群成堆的居民中找到我的影子。我确实很傻，但在这个愁风惨惨的洞穴里，还活蹦乱跳地活着，而其他人虽然机敏，头脑很灵活，但现在却沉睡在虔诚教徒的梦境中；换句话说，那是公正的判决。您，堂路易斯·皮内多先生，《惨死如狗》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其中的一员。您在那个荒诞的标题下，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蔑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光明磊落的绅士、纯洁无瑕的男子汉，即令人难以忘怀的博卡内格拉总统。他死时，名字上有那么多仇恨的唾沫和全国人民的眼泪混杂在一起。我要把这一切清洗干净；我要抗议、痛斥，要把皮内多那个小蝌蚪在书中所写的、他的同类到处所宣扬的那些观点驳得体无完肤，要为恢复总统名誉而斗争。（有的人不懂蝌蚪这个词的意思，皇

家学院编纂的辞典上有解释。蝌蚪就是青蛙的幼虫,尚未长出四脚,但在水中能像鱼儿那样自由游动。)对,是这样。蝌蚪先生,水虫先生,癞蛤蟆先生:您判处的那些死人,现在活得很好。我以我的名义,并以您伪撰的某些死者的名义向您致谢,十分感谢您的悼词。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几乎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仍然在复刊的《商报》上撰写专栏文章,推销他的语法细则。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也应该归功于他当时佯装死去。正因为如此,他现在才得以帮助我(他也正在帮助我)写这本书(或者说是小册子,或者说是别的什么东西),以维护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维护那位伟大的卓越功勋。有些人本应该为他的名誉增辉,却不遗余力地往他脸上抹黑。

但是,任何人都知道,感激之情并不是时间的产物,而我如果向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某些小人物(我们不愿意把他们称为水虫)索讨那种感情的话,一定会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唉,我还是在自己的卑微的社会环境里,在实践中索讨那种感情吧(我也确实在这样做);比如,写这部作品。说到感激之情,在结束这个开场白(也可以称为文前提示或解释性前言)之前,请允许我向我的合作者堂路易斯·罗得里格斯表达这种感情。如果不是他及时提出建议、劝告,甚至修改、润色文字,那么这部小小作品肯定就拿不出手了。恰如古代骑士大多数是使用宝剑和长矛的能手,而不能耍笔杆子一样,我这个当代骑士,新世界的后代——此外,还是受人尊敬的商人——,如果说还有点出众之处的话,那就是一拿起台球杆来,必然会让许多人产生嫉妒心理,并露出满脸的沮丧表情。然而,在办公室里,连雇员们都会使用的打字机,我也不会使用。就是说,不能像严肃、认真的老作家那样使用。今天,只有少数人——比如我的朋友罗得里格斯——才具有工作认真、水平高超这些优秀品格。毫无疑问,他是个保守意识非常浓重的作家,但他能顺应我们时代的潮流,不像某些逆潮流而动的人那样对打字机不屑一顾,而是爱不释手,抚摩它,学会使用它,靠它谋生。作为一名杰出的记者,他的大名

① 是皮内多的爱称。

无人不知。如果说世界上还有文化人的话,那就非他莫属了。他甚至还是律师(几乎可以说,他毕业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德拉这所古老名牌大学法律系),但不像他的无功受禄的同胞们那样趾高气扬,在困难面前决不会退缩。他什么事都做得漂漂亮亮的。除了他,谁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我去做现在冒生命危险所做的工作?很明显,他是最好的人选。所以,我在和妻子聊天时产生了要写点东西(最后写成了现在这种辩护书样的东西)的想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细节的话,那么是她,是克利娜提出了那个好主意;是她鼓励我尽早写出来的。“人们都说罗得里格斯是个有名的作家,为什么不向他提出合作的想法?当然要给他劳务报酬,他就是干这种事的呀!”我不能否认,一开始,我觉得她的想法很愚蠢,简直是胡闹。克利娜不懂得金钱来之多么不易,花钱如流水。听了她的建议,我气坏了。但是,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我才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想做我想做的这种事(到底是怎样的事,眼下还不清楚),现在来说,能够提供最大帮助的就是罗得里格斯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再说,还有一件十分凑巧的事:在刚刚过去的骚乱中,我们两个人都被宣布为死者。在那几个困难的星期里,就是说,烈火四处燃烧的时候,罗得里格斯和我一样,做出了理智的决断,没有卷入事件中去,从而也没有因参与骚乱而遭暗算。我们逃得无影无踪。当然啰,那是为了以防万一。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而报界则是首当其冲者。罗得里格斯躲藏了起来,这做得很对。而我的理由虽然不像他那样充分,但躲藏起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甚至还可以说那是个好机会,自我放假的好机会,我很久以前就在心里暗暗地打着这种小算盘了。我立刻按照罗马诗人奥拉西奥的做法,即把好的东西、有用的东西收拢起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利娜那只可怜的母猫,我很需要躲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呆些日子。我提醒她,24小时以后(这么多时间足够了),她就可以认为我已经躲到国外去了,从而可以到处宣扬不知道我的下落,并露出担心、恐惧的样子来。应该说明一点,她表演得很出色,很逼真。只是后来,在看到危险已经过去,其他受到迫害的人也已大摇大摆、口中念念有词地抛头露面,而我仍然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死是活的时候,她才开始

真的恐慌起来。那个纯贞的天使跑到罗得里格斯的家里(那时,朋友们正用甜点和雪利酒庆贺他的复活),向满面春风的拉萨罗和他的忙里忙外的妻子讲述她的担心和不安。他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罗得里格斯也躲藏了起来,谁以为他知道我的下落,那简直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而那时我们刚刚认识罗得里格斯不久,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她,虽然也许不那么审慎,因为他非但不安慰她,说我迟些露面不值得大惊小怪,反而也对我那时还不回来感到惊讶,还埋怨我都不给妻子发个电报、写张明信片。在他看来(那是火上加油),我说不定去了极乐世界,不想看见那些振奋人心的、到处宣扬的骚乱已告结束、国家威信正在重新恢复的情景。而他呢,藏在一位同乡开的店铺的地下室里长达一个月之久,当然啰,就算在他得知个人生命和财产重新有了保障时,他仍旧没有从洞穴里爬出来呀!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去向他道了谢;他很关照克利娜,曾好几次亲自陪她去打听我的消息,虽说结果是一无所获。从那以后,友谊诞生了,我的回归为这种友谊又增添了欢乐,有时还开个小玩笑,说是要筹建受迫害者俱乐部,我、他和另外几个被称为暗杀阴谋之幸存者都应该成为这个俱乐部的终身领导成员。如果说我最终决定要为博卡内格拉写一部恢复名誉的作品,并且要请罗得里格斯帮忙的话,那么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克利娜第一次向我提出那个想法时,我本可以这样回答她的。但那时我心绪不好,根本没有想往前走下去。她这个人很固执,又没有多少事可做,之后又向我发起两次攻势,用同样的话或者相似的话说服我,直到看到我软了下来,委婉地说“你觉得可以吗?”时,她才认为事情成功了,进而坚持说:“当然啰,亲爱的;你把他约到家里来谈,家里比外面方便。他来了,我们请他喝上几杯加冰块威士忌,你把想法给他详细讲讲,不要过分渲染……”她认为我有些浮华,我没有理睬她,她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女人什么也不懂,观察事物的方法很荒谬,反复无常。她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不,还是你单独和他谈比较好,我还是不介入吧!”对,对了,她有什么可介入的!她肯定是担心我不会见机行事(她还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社会意识),会说出蠢话来,会把事情搞

糟。于是重新回到原来的计划上去，还是把他约到家里来。“一定要按照我所认为的最好方式去做，”我好言好语地打断她的话说。那么，我认为的最好方式是怎样的呢？最后是他请到他家里来了。

加利西亚人得知我的具体想法以后，先是有点不情愿，说那个计划虽然很好，是爱国的，是这样，很好，但他很快发现，立刻发现，该计划有许多不足之处。做起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列举一大串棘手的问题。这个小加利西亚人——我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聪明极了。后来，几杯酒入肚以后，他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障碍也一个个排除了。最后，当我十分谨慎地谈到对他的报酬（我用的是补偿这个词儿）时，他马上跳了起来，觉得西班牙人的那种有名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我应该承认，他这次表现得十分坚定，寸步不让。我们让大好人路易斯·罗得里格斯接受下来的唯一一个请求就是常到我们家来吃饭。这样做，从我们当时的交情上讲，不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你，利诺，这是明目张胆地剥削我呀！你让我干活，却只给我一口饭吃！”他开玩笑地说；加利西亚人所特有的嘲讽劲儿是很尖刻的。很自然，在每天干八小时活，有时还要聊上一阵子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我们的朋友回到他那如同疯人院和猪圈一样的家里去吃晚饭呀！同样自然的是，我们通过合作加深了接触，从而友谊也就更加亲密了。我们甚至很快地，应该说是不知不觉地你我相称起来了。我还记得，一天我贸然地问他，你签字时每个字母都写得很漂亮，而那个R写得更惹人注目；可是，R是什么意思呢？我早就想问你了。“也……也是罗得里格斯的意思呀！”他笑着回答说。“好家伙，了不起！”我说。当时，克利娜也在场，她顺便打趣地说：“真的，我的朋友，怪不得你这么固执呀！”她对他说。“这么说，你是叫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这不是说把钉子钉好以后，再用力钉两下吗！”这些话都是为了逗笑而已。但是，那天我们三个人过得都很开心。路易斯还兴致勃勃地补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姓还不够显赫的话，那么为了你们，我完全可以像我的同乡瓦列·因格兰^①那样做，再加

① 瓦列·因格兰(1860—1936)，西班牙作家、诗人和戏剧家。